

戈巴契夫對東歐的政策

龍舒甲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壹、前言

身為列寧主義者與共產黨員的戈巴契夫，在繼任蘇共領導人之前，即已清楚地了解到，「史達林主義」模式的社會主義在蘇聯已走上窮途。唯有改革這個社會，才能真正「充分發揮社會主義的潛力」，^①確保政權的存續與保持蘇聯在國際體系中的超強地位。而且，他也認為，當前世界上所有的國家要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緊密地相互關連，所以需有一個新的政治思維，把蘇聯的對外政策調整為「改革之哲學、綱領與實踐的直接表現」，^②以便能具體地顯示出「在國內的活動與在世界舞臺上的活動之目標是一致的」。^③於是，在他上任後第二天，即向那些前往莫斯科參加已故蘇共中央總書記契爾年科葬禮的東歐各國領袖們表示，蘇聯在日後「除了要加强經濟效率和東歐集團對外活動的協調工作外，還將致力於減低與西方的緊張關係」。^④不過他的優先目標，仍是要維持蘇聯與東歐間的緊密關係。

在戈氏執政的五年多當中，東歐也因蘇聯的改革而產生了「連鎖反應」；其形勢變化之快却超出了戈氏的想像與預估，尤其當改革在東歐發生之效應，回過頭來衝擊蘇聯時，戈氏對東歐的政策，亦勢必要有所修正。

儘管東歐是蘇聯全球外交戰略的一部份，但是蘇聯外交的決策者、東歐內部的變化、與戈氏對東歐改革之評估等內在因素，以及蘇聯、美國與歐洲三邊關係等外在環境都會明顯影響到戈氏對此一地區政策之決定，因此，本文即擬從這些內外環境因素來探討戈巴契夫對東歐的政策。

註① 米·謝·戈爾巴喬夫著，「改革與新思維」，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三月，頁三。

註② 同註①，頁一一四。

註③ 同註②。

註④ 真理報，一九八五年三月十四日，頁三。

貳、戈巴契夫的外交理論

一九八六年二月下旬，戈氏在蘇共「廿七大」的「政治報告」中表示，蘇聯國家的經濟與社會的發展，也決定著蘇共中央的外交戰略。⑤翌年七月，蘇聯科學院院士普瑞馬柯夫（Ye. M. Primakov）在真理報上，以「外交政策新哲學」來解釋戈氏在「廿七大」所提出的「外交戰略的基本目標與方向」。普氏的解釋，包含著以安全問題為主的新概念：

- (一) 在確保國家安全上，應以政治手段為主；
- (二) 軍事在目前的情況下，在確保對立雙方的安全上仍具有其重要性；
- (三) 一國的安全不能犧牲他國的安全而獲得確保；

(四) 在美國與蘇聯以及北約與華約兩組織之間，不應使對抗面擴大。⑥

普氏認為，蘇聯外交措施的彈性與建設性，將有助於國際情勢朝和緩方面去發展，也能促使西方輿論開始改變其以往不友善的態度與聲音。

同年十一月，戈氏在慶祝蘇聯革命七十週年的演講中表示，「和平共存」已成爲核子時代裏全人類生活的條件。新思維及其對所有人類的共同標準，與它對理性及公開性的要求，已開始在世界事務中有所進展。所以：

(一) 在當今世界體系秩序裏，社會主義國家必須與資本主義國家共同建立一個安全的世界，而資本主義國家亦須承認「相互依賴」之事實與重要性。

(二) 新的國際經濟與政治程序有待認識與瞭解，因爲這些程序，具有客觀定律的力量，而當前則是要把「爲發展而限武」的觀念付諸實施。

(三) 社會主義已發展至新的階段，但它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模式」可供任何國家去仿效。而社會主義國家亦須承認一個無條件而完全平等的原則，彼此間才會有較好的關係。⑦

其後，戈氏在其著作「改造對我國與世界的新思維」中，針對社會主義國家間的新關係，提出了重建的原則與執行的方

註⑤ 真理報，一九八六年二月廿六日，頁一一二。

註⑥ 真理報，一九八七年七月十日，頁四。

註⑦ 真理報，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三日，頁一一五。

向：

(一)蘇聯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合作必須注入更大的活力與進行某些改革。

(二)過去蘇聯以其模式強加於人，使得其他的社會主義國家也不免付出了嚴重的代價；因此，今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政治關係要嚴格建立在完全獨立自主的基礎上。

(三)社會主義國家的黨與政府不僅要關心本國的利益，也要關心共同的利益；尊重朋友與盟國，和重視他們的經驗。

(四)藉著延長「華沙條約」的有效期，把「華約組織」成員國個別的倡議與共同一致贊成的決議，在國際事務中結合起來。

(五)在「經互會」裏，除了把「社會主義大家庭」的經濟關係建立在遵循互利與互助原則的基礎上之外，還須在經濟政策、長期合作計畫、規範原則、法律與經濟的條件等方面，以協商方式來協調、制定與實施。^⑧

由於戈氏強調人類的生存與人性的尊嚴，所以在選擇生存的前提下，消除核武器、核戰爭與核威脅，乃是刻不容緩的要務；也因此充分顯示當今社會主義政治與經濟的活力、人道的生活方式，以及國家與人民生存之道中所存有不可避免的相互依賴性的特點時，改革「社會主義大家庭」內的關係也不應再被耽誤與拖延。

至今，「新政治思維」已成了蘇聯外交戰略的指導方針與運用原則。在任何對外政策的報告或談話中，戈氏均一再重複他的「外交理論」的要點，並依此而發展出若干構想與提出若干倡議。而戈氏對東歐之政策的理論基礎，也可從上述的戈氏言論及著作中看出輪廓與端倪了。

叁、東歐內部的變化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當戈氏提出「更多的社會主義，更多的民主」這個原則之際，^⑨也同時承認，由於蘇聯在過去曾背離與歪曲了社會主義原則，所以才會造成一九七〇至八〇年代的困難與問題。如今蘇聯人仍相信社會主義，但並不強迫任何人接受蘇聯人的信念，而是讓每個國家作出自己的抉擇，也讓歷史對一切作出結論。另外，戈氏更認為，東歐國家在發展的過程中，由於曾全盤接受了「蘇聯經驗」，所以，不但出現了嚴重的政治危機，也造成「大家庭」成員之間嚴重的不協調現

註⑧ 同註①，頁一四〇—一四六。

註⑨ 同註①，頁廿四。

在戈氏對蘇聯「民主化」提出期望，及對社會主義國家痛陳缺失弊端之後，對東歐國家的「民主化運動」於是開始產生了催化作用。

一九八八年五月下旬，首先發生變化的東歐國家便是匈牙利。匈國「社會主義工人黨」(MSZMP)總書記卡達爾(János Kádár)在掌權卅二年之後辭職；而後該國國會又投票通過，允許公開的示威遊行及獨立的政黨存在；接著又更改黨名，並聲稱要實行民主的社會主義；以及宣布修憲，使多黨制合法化及準備民主的選舉。

正當匈牙利處於變化之際，波蘭也幾乎是在同時走向「民主化」。反對派「團結工會」(Solidarity)在一九八九年四月初不僅獲得合法地位、活動自由化，而且更在六月四日波蘭第一次的民主選舉中，得到了壓倒性的勝利。

至於東德，在戈巴契夫訪問東柏林及建議「東德統一社會黨」(SED)主席何內克(Erich Honecker)要「承認事實、迎合民意、自求多福」之後不久，先有何氏被迫下臺，繼而宣布更改黨名，再就是選出克倫茲(Egon Krenz)為新的國家領袖，然而這一切安撫作用，仍挽救不回民心的歸向。去年十一月上旬，東德索性宣布開放「柏林圍牆」，並著手將它拆除。如此一來，不但導致東德共黨政權從此勢弱聲消，而且還加強了東、西德的統一步調。

至此，儘管世人仍在猜測蘇聯出兵干預東歐劇變的可能性與時間，但是不可否認的，世人也正式開始全面扭轉了對戈氏的疑忌，並對他的「新政治思維」給予極高的評價。

從去年十一月起，東歐的政局起著連鎖反應式的變化，保加利亞共黨(BCP)換了總書記，捷克斯洛伐克共黨(KSC)交出了政權，羅馬尼亞共黨(RCP)領導人齊奧塞斯庫(Nikolae Ceausescu)夫婦命喪於流血革命之中。到了今年，南斯拉夫廢除了共黨專政，阿爾巴尼亞勞動黨(APL)領導人阿利雅(Ramiz Alia)也宣布民主進程是不可逆轉的。

凡此種種，實可歸因於戈氏的影響，及受到他「不干預政策」(Hand-off Policy)的容忍，所以，東歐內部變化的過程與方向應與戈氏所期望的也相差無遠。

肆、戈巴契夫對東歐改革的重新評估

儘管蘇聯是「東歐集團」的領導者，但是當該「集團」內的每一個國家開始改變時，蘇聯不但不可能置之度外，相反地

註⑩ 同註⑥。

還必須密切注視其發展動態。蘇聯當然瞭解自己正身處於兩難，然而却不希望「集團」崩解太快。所以，蘇聯爲此與各東歐國家在建立共識與達成協議時，就希望各國在改變的速度上能審慎地處理，而不致於再增加若干令人不安的變數。

戈氏對於蘇聯自身與東歐需要改革的原因所抱持的一個根本觀點即是：過去一切負面的現象都是「史達林主義」的遺禍。⑭事實上，「史達林主義」在蘇聯與東歐成爲一個幾乎無法對付的惡魔已將近半個世紀之久，它以意識形態主宰著人們的心思與意念；它在這些國家的內部，宰制著人民的行爲與生活方式，監控著傳播工具的運用，束縛著文化與社會的體系，和框牢著政治與經濟的管理；同時，它藉這些國家對外政策與關係的理論，強調以社會主義蘇聯爲首的國際體系，和以資本主義爲號召的國際體系之間，在本質、態度與手段上，存在著勢不兩立、你死我活相互長期鬭爭的嚴酷事實。

一九五〇年代到六〇年代之間，由於赫魯雪夫對史達林體制夢魘般的驚懼而進行「非史達林化」，雖曾打倒了史達林的偶像，但因未深化運動，及無法剷除「史達林主義」與屬於既得利益的官僚組織，而使得赫氏被迫下臺，也使東歐的「民主化」革命很快地就遭到摧殘。到了一九八〇年代後半期，經過戈巴契夫的深思後而著手「非史達林主義化」，總算改革得以啓動與前進，但蘇聯在轉變自己的政、經體制及重新部署與西方國家的關係時，也必須調整她與東歐各國間的連繫與步伐。

以往因爲「史達林主義」的作祟、資本主義世界所表現的敵意與「侵略性」，再加上各自擁有相對數量核彈以自重、免於威脅及嚇阻對方之心態下所呈現的兩極化世界觀等影響，社會主義世界與資本主義世界的緊張關係幾乎是游走在共同毀滅的邊緣。爲此，東歐各國在大戰爆發時所要執行的乃是，進可以擔任「第一擊」摧毀西方主力的橋頭堡，退可以扮演避免蘇聯「正面受敵」的「緩衝器」；也就是說，蘇聯有意把自己與東歐透過了政治、軍事與經濟三方面手段來構築成一個堅強的攻防體系。

然而，戈氏認爲，在長期的「冷戰」與對峙之後所能得到的唯一結果，就是：在核子戰爭中沒有勝利者。⑮與其如此，何不以「和平共存」、「經濟互賴」來化解那凍結已久的仇視與緊張。同時，戈氏也深刻感受到：社會主義國家想從危機中脫困求生，若不實行完全的民主，就不可能有成功的社會主義。而且他更同意，由於西方社會貨物豐富，管理、技術與生活的新穎、先進與舒適，使得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承認，自己已面臨到了該解決自己複雜困難的社會政治發展的歷史關卡。⑯

註⑭ CDSF, June 3, 1987.

註⑮ 真理報，一九八七年五月卅日，頁一一。

註⑯ *Kommunist*, No. 18, Dec. 1989, pp. 73-77.

有鑑於此，他相信，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一方面是一種社會主義自我更新的自然過程，另一方面也是一種人類進步的主要成份，及不同社會經驗的聚合與充實。他覺得，處此當前世界發展的複雜時期，蘇聯的「政治體制模式」實在無法使東歐各國真正地建立起完全獨立自主的基礎和相互尊重與合作的誠意；因此，蘇聯何不先學習放鬆緊張、尊重兄弟與同志、考慮他們的利益、更新合作的形式，而讓雙方的政治關係能逐漸走上正常的道路。在免除威脅方面，「華約組織」除了不再把「北約組織」視為意識形態的敵人，以及希望和「北約組織」進行「建設性的合作」之外，戈氏同意要把「組織」本身作更民主化的改變，而且還告訴「華約組織」各國的外長們說，他已準備好面對各成員國相繼退出「組織」或「組織」解散等可能情況的轉變。^④對於經濟關係，戈氏曾表示，蘇聯與東歐各國應在社會主義經濟上進行「非史達林主義化」，把史達林時期的那種意識形態、心態、作風、制度等影響因素，從經濟理論、組織、決策、管理和執行各方面，一概清除，以提高經濟效率；同時也藉著加強與西方經濟關係的合作，來恢復社會主義經濟的生機。

伍、蘇、美關係的影響

蘇聯與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逐漸加深彼此的疑懼與鴻溝，進而形成全球政治、軍事、經濟與意識形態的兩極化與「冷戰」。但位於東歐的波蘭竟成爲「冷戰」的起因點。

雖然雙方都以「世界和平的維護者」自居，但却勾心鬪角，相互算計；儘管兩大超強均強調「爲世界和平而鬪爭」，不過也一直未見真以兵戎相見；固然二者皆傾全力發展核武器與「星際戰爭」武器以嚇阻對方，而結果竟也相當程度地約束了另一方可能的冒險盲動。東歐諸國就在這兩強的反覆無常之間，一方面要徹底地支持蘇聯的政策與行動，另一方面又要身不由己地擔負著「擋箭牌」的任務以防衛蘇聯的「第一線」安全，和減輕蘇聯部份軍事防衛的負擔。

蘇、美兩國，在一九五〇年代初期，雖曾各組集團相互制衡，但爲了降低戰爭發生的可能性，及瞭解對方真正的意圖，便從一九五九年九月開始舉行「高峯會議」。儘管蘇聯認爲，高峯會議的召開對於雙邊關係的發展、世界問題的解決、裁軍措施的有效執行均有所幫助，可是卅多年來，因爲存在著不信任對方的心結與不安氣氛籠罩形成的壓力，也隨著核武器質與量的更新與增加，蘇、美雙方歷來所舉行的高峯會議，也幾乎一直是以「限制武器」來作爲建立和平的基礎與作爲和解談判的籌碼。不過，蘇聯在東歐所部署的武器則一直是保持著領先的狀態與隨時可壓制對方的優勢。同時，東歐諸國的軍事裝備

與人員也必須接受蘇聯的供應整合與訓練調度，而且，她們還得提供通訊線路與後勤補給去支援蘇聯的駐軍與設施。

若干年來，蘇聯與東歐之間，藉著「華沙公約」與「經互會」的協議與活動，和利用高峯會議、外長會議與年度協商會議的召開、雙方高層領導人物的互訪與一些不同名目的聯合軍事演習的舉行，來達成彼此在政治、經濟、軍事上的一致性、整體性與靈活性。蘇聯如此積極地把東歐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並促成東歐內部的整合、政權的穩固、對蘇聯的依賴，及提供蘇聯西側安全防衛上的緩衝之作法，正足以說明蘇聯對「生存威脅」與「戰爭恐懼」的疑慮心態。

戈氏在上任後即表示，儘管當代世界是相互矛盾的，但也是相互連繫與相互依賴的「一個整體」。⑤要想消除緊張、放棄對抗，蘇聯不應再把美國視為「頭號敵人」。也唯有將美國看作當今世界和平的要角，先與美國建立誠實而公開的關係，共同地培養起相互瞭解、充實與交流的責任感，才能避免重蹈過去「玩弄政治」的覆轍，真正改善雙方的關係，重新調整蘇聯與其盟邦的形勢，及確實解決地區衝突的問題。

因此，他先與美國的雷根總統在日內瓦、雷克雅未克、莫斯科、華盛頓等地，藉「高峯會議」來增進彼此的了解，把雙方的對話從政治迷霧與誇大不實的宣傳中解脫出來之後，才能發展到「冷戰」開始解凍的地步。

接著，他在不影響安全與穩定的前提下，逐步地自東歐裁撤軍事武器、人員與裝備，以減少資源的消耗與減輕國防經費的負擔；他同時引進更多的西方資金與科技，來幫助蘇聯與東歐渡過經濟的難關。

其實，從蘇聯對東歐的「民主化運動」所實施的政策來看，戈氏就是希望以民主與開放的姿態，在蘇、美關係中增加對蘇聯有利的因素，使得美國的國會與人民在欣賞戈氏個人形象與作風之餘，也會更加要求與敦促美國政府，從長遠世界和平的眼光，樂意予蘇聯以「一臂之力」，期能使蘇、美雙方經數十年努力所建立的互信與默契更加鞏固與深厚，並進而讓蘇聯與東歐維持著另一種合乎現實與未來發展形勢的關係。

陸、蘇聯與西歐關係的影響

法國前總統戴高樂 (Charles de Gaulle) 曾從地緣政治的觀點傳播「歐洲的範圍是從大西洋到烏拉山」這個概念。戈巴契夫則在上任前後，分別訪問過英國與法國，並對歐洲的地位和角色作了考慮之後，形成了「蘇聯也是歐洲的一部份」的觀念。他認為，蘇聯不但應從歐洲史中學習教訓；而且應讓也是歐洲人的蘇聯人合法地繼承歐洲的文明；並把從大西洋到烏

註⑤ 同註①，頁一一九。

拉山的整個歐洲建築成全歐洲人共同居住的「全歐大廈」(Common European Home)。這是戈氏的「新政治思維」中對歐洲的看法。^⑩

歐洲在二次大戰期間，飽受戰爭的蹂躪，戰後，又成了東西方「冷戰」的競技場與武器倉庫，這片土地何時會再成為核武器的試驗場或是從此變成一片荒無人煙的廢墟，這是每一個歐洲人的隱憂。戈氏首先將埋藏人們心底已久的事實發表出來，作為重建全新歐洲的起點。這也表示，只要當歐洲人對此危機有著共識之時，那麼接著要做的工作會比人們自意識形態的漩渦中掙扎出來容易得多了。

戈氏瞭解，歐洲不是美國，儘管在蘇聯還沒有成為西歐各國的盟友之前，軍事集團對立的形勢仍暫時不會消失，但是蘇聯明白指出，她與西歐具有相同的命運。蘇聯不希望生存在具有敵意的陰影之下，也同樣地不希望歐洲人民把蘇聯當作威脅的根源。所以，「和平共存」在歐洲，也就表示，各國根據客觀的條件和具體的需要，作出自己的抉擇之時，也願意承認與尊重現實局面。

因此，戈氏在就任後不久，便著手消除分裂歐洲的舊思維邏輯，建議解散形成軍事上和政治上對立的軍事集團，以及逐步裁減各國軍力到「合理的足夠」程度與銷毀部署在歐洲各個角落的核武器與化學武器。

戈氏藉著與西歐各國領袖的互訪，把「新思維」的概念與觀點，在協商、對話與諮議的過程中表達出來。同時，他也以消除任何會給歐洲帶來不安與不穩定的現象為使命，一方面與這些領袖們保持經常性接觸，以增進瞭解，化解敵意與誤會；另一方面則以協議來維持彼此相互依存的形勢，和建立互信的基礎，以解決歐洲所面臨的共同問題。

就在戈氏積極與西歐拉攏距離，消除對峙局面的同時，蘇聯對東歐的控制也在放鬆。戈氏希望東歐人民與領袖能體認「新思維」所代表的，就是未來蘇聯與東歐關係的基礎。而「華約組織」的軍事部署，也會本著「新思維」的精神，表現出「防衛性的防衛」，以消除西歐對蘇聯之意圖的疑慮。^⑪同時，對於「經互會」的運作方式與經濟負擔，蘇聯將逐漸地改變與減輕，而且，蘇聯還鼓勵「經互會」各國與「歐洲共同體」加強關係，使蘇聯與東歐的短缺物資獲得供應，也讓蘇聯與東歐的建設需要得以滿足。

事實也證明，在目睹了東歐所發生的「民主化運動」之後，戈氏在蘇共「廿八大」的「政治報告」中，首先對那些宣稱「社會主義已經崩潰」的人反問了一個問題：「那一種社會主義」？戈氏認為，如果是「史達林主義」式的社會主義的話，

註⑩ 同註①，頁一六八—一七三。

註⑪ CRS Review, April-May 1989, pp. 4-6.

那麼蘇聯早已在平靜中完成了驅除「史達林主義」模式的社會主義的任務。接著，他又表示，蘇聯與東歐是永遠的隣居，有著經濟與政治上的共同利益，這些利益將會引領著大家更緊密地朝和平的歐洲與「全歐大廈」邁進。^⑧

由於戈氏對東歐的容忍，不但促成了東、西德的統一，而且也為今後蘇聯與西歐的關係開啓了嶄新的里程。西歐各國勢必會給予蘇聯與東歐更多方面的援助與簽署更多種類的合作協議。因此，當歐洲人民對於「全歐大廈」之目標愈來愈感到接近時，也一致決定把一九九〇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給戈巴契夫，以肯定他的思想、作為與貢獻。

柒、美國與歐洲關係的影響

過去，美國與西歐各國，為了防止共產主義的擴張而成立了「北約組織」，四十多年來，由於這個組織的存在，雙方關係一直都是建立在由反共的意識形態所主導的「圍堵政策」上，也由於美國可算是半個歐洲國家，^⑨因此，美國與西歐之間，總是以合作、溝通、交流、協助等方式，在政治、軍事、經濟、科技、文教等方面加強彼此的承諾與友誼。不可否認的，西歐的政治穩定，經濟由復甦而繁榮，人民生活自由，以及軍事力量鞏固，一方面保障了西歐的安全，防護了美國的安定與強大；另一方面也牽制了蘇聯的「西進」企圖，鬆動了東歐對社會主義的信心。

「北約組織」中的美國與西歐六國，在以往曾積極地保持聯盟團結與足夠的防衛；對付蘇聯與東歐在政治與軍事上的挑戰；以及抗衡蘇聯在歐洲核武力的優勢。而「華約組織」裏的蘇聯，則因為迷信於武力能解決一切問題，所以對東歐各國推行軍事一體化；同時還統一各國的軍事計畫，協調各國的軍事、外交政策，和加強軍事上的控制等，目的都是為了不允許「北約組織」對「華約組織」取得優勢。為此，當蘇聯與東歐在面臨對手的壓力與對峙時，便只有把信心建立在增加核、化武器與傳統武力的數量與部署上。

此外，在雙方都依據「以實力作為談判的基礎」之原則下，彼此一面以核、化武器的種類與數量在談判桌上討價還價，又一面以虛偽與隱瞞的態度在「政治對話」時玩弄著爾虞我詐的心戰技巧，同時在談判桌後藉著「汰舊換新」、「偷天換日」等手法進行著武力的加減遊戲。因為大家在基本上就先已預存著互不信任的心理與威脅恫嚇的姿態，所以經過這麼多年談來談去的結果，緊張的局面則始終緩和不下來。

註⑧ 真理報，一九九〇年七月三日，頁二—四。

註⑨ Lothar Spahn, "Europe is Both East and West", *International Affairs (Moscow)*, May 1990, p. 45.

但在戈氏公開其「新思維」之後，情況有了明顯的轉機。自一九八七年以來，蘇、美兩國領袖展開了一連串的接觸，在裁軍進程上有了空前的突破，除了簽署撤除駐歐中程核武器的條約之外，另外還在戰略核武器與中歐地區傳統武力的裁減上，都取得了重大的進展。所以美國與西歐除了表示要通過蘇聯與東歐繼續進行「建設性對話與廣泛合作」和「尋求東西方真正的緩和」之外，西歐各國也為此樂觀前景而敦促美國針對蘇聯的裁軍建議能提出更多建設性的對策。

尤其是西歐人民對戈氏本人的好感與日俱增時，對要求撤走美國駐軍與所儲存的核子武器與化學武器的聲音也相對地提高了。這的確使得西歐各國政府處於兩難：儘管這些國家的領袖有意確保西歐與北大西洋地區的安全與穩定，以及肯定美軍駐防的價值與貢獻，可是他們也必須重視民意的依歸與選民的現實。

美國與西歐原本是希望先解除蘇聯的威脅，與推動東歐各國脫離蘇聯的掌握，但是戈氏不但首先促成東歐的「民主化運動」，和降低以往的緊張態勢，而且還在西歐人民之間製造了蘇聯「本無求戰之意，只為和平相處」的良好印象，這使得一向只想加強防衛力量的美國與西歐領袖們，在面臨戈氏靈活的政治手段時，反而有尷尬之感。

今後，美國與西歐在經濟上對蘇聯與東歐的援助或許會多於在軍事上維持著對蘇聯與東歐的抗衡。事實上，當「華約組織」已在逐漸變質或面臨解散時，「北約組織」也開始面臨了存廢的考驗。

至於美國對東歐的態度，因為布希政府到目前為止仍未曾有一明確的「東歐政策」放在檯面上，所以美國對東歐的影響力尚不足以讓蘇聯緊張。布希表示，他本人一方面對東歐的變化未定而持靜觀之意，另一方面他也不希望過度刺激蘇聯，引起不必要的反感與臆測。所以，只要蘇聯對東歐保持理性與開放的態度與心胸，美國是永遠也不會去多事的。

捌、結 論

蘇聯與東歐六國由於長期經濟不振，而一直冀圖在社會主義體制內進行經濟改革，以求脫困。戈巴契夫眼見蘇聯內部的沈痾，東歐共黨領導人試求突破現狀的窘境，便在上任後不久，以「改造」、「公開性」和「民主化」的政策來進行一場結果難料的「自我革命」。

值此階段，戈巴契夫對東歐的政策，以及蘇聯和東歐的關係都需有新的調整與適應。就戈氏本人而言，他強調蘇聯在社會主義世界與東歐共黨的統治須慢慢地放棄其領導地位的角色；他認為，沒有人有權在社會主義世界享有特殊地位；他也相信，每個黨的獨立性、各黨對自己國家與同胞的責任，及各黨有權決定自己國家發展的問題，應是無條件的原則。對於東歐內部的改變，屬於改革派的蘇聯人士都對之抱以樂觀與支持的看法。事實上，不論東歐的改革如何發展，他們仍脫離不了歐

洲大陸的領域，也必然受歐洲現實環境與局勢的影響，雖然改革者可以決定往那個方向走，但是也要考慮到自己的需求、能力與他國給予援手的意願與範圍，因此，這在戈氏對東歐的政策上產生了驅動力，也產生了影響力。的確，蘇聯的開放與民主，讓東歐對自己的改革前途更有信心，可是，東歐的黨政領袖們也存有「投桃報李」之心，而更願意與蘇聯交換意見、相互合作，減輕壓力。這也使得蘇聯對「華約組織」與「經互會」的角色、性質、功能與活動的改變與運作方式，採取更具民主化與建設性的政策。

事實上，不論美國的打算為何，戈氏已經表示，在「相互依賴」變得重要的今天，東歐不應再成爲蘇、美兩大超強對抗的犧牲品。撇開蘇、美之間存在矛盾的事實，兩國尚有許多方面可以尋求改善與加強合作，而東歐也仍有自己的利益與發展道路可以追求。所以，蘇、美關係的正常發展也同樣會影響到蘇聯放棄再把東歐國家充當自己的「緩衝區」的意願了。蘇聯對「全歐大廈」藍圖的設計，已使戈氏與歐洲各國元首，包括教宗在內，均已積極接觸，以爭取「安全」與「合作」兩大目標的達成。兩德的統一與東歐的改變均有助於未來「大廈」內每家住戶的和平相處，如果「北約組織」能改變其結構與思維，那麼新的歐洲安全體系或許能取代這兩個「冷戰遺物」，而更能維持歐洲的長久和平。戈氏也曾表示，蘇聯對歐洲和美國之間關係所抱持的態度是重視而不會破壞，因爲蘇聯並不想利用這種關係來冒險，甚或引起不必要的混亂。反之，蘇聯在強調歐洲的獨立自主立場之際，會儘量與美國交換看法，保持密切的接觸，以維持過程的透明化。②當然，蘇聯也希望美國在掌握東歐情勢的轉變與部署進入整合後的西歐之同時，不至於對東西歐有差別待遇，或將蘇聯排擠到「全歐大廈」的門外。

雖然戈氏認爲，「冷戰」已經結束，但是隨著一九八九年下半年東歐各國一黨制政權的結束，及一九九〇年上半年這些國家「政治多元化、選舉民主化」的開始，或許可宣稱，東歐第一階段之「民主化」的革命已告完成；而第二階段，却因牽涉到新的政治與經濟各種制度的建立，故將會費時若干年才能有結果；至於第三階段，主要是以不同方式的內部措施與國際保證來鞏固「革命」的成就，及允許東歐加入「全歐大廈」的過程，又可能再等上幾年。因此，今後戈巴契夫對東歐的政策勢必還會隨著時間、環境與需要而續作修正或改變。

註② 同註①，頁一八六。

*

*

*